



从『省港』到『湾区』：

大珠三角的百年『红色足迹』

广州市越秀南路东园横路3号，一座红色的小楼静静矗立在高楼间。

这里曾经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墅。96年前，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席卷广州和香港两地，它的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驻扎在这里。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指派邓中夏、苏兆征等5人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陈延年等6人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广州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

“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两地工人互动联系一直非常密切。”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副研究员冯惠说。为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

这场大罢工持续了16个月，参与人数达到25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实践。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如今，省港总工会委员会旧址之上，已建立起了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它见证着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成为党最坚实可靠的阶级基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成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族解放斗争旗帜的伟大政党；见证着党的领导下，包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走向解放和发展的“红色足迹”。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大批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寇搜捕，处境危险。紧急关头，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等通力合作，组织营救。

这场空前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通过海路和陆路两条秘密交通线，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茅盾、邹韬奋……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撤离。

最终从港九地区营救出国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800多人，还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感慨“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珠江水浩浩荡荡，奔流汇入伶仃洋。曾见证国家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三角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又书写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1980年，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春天的故事”在这里唱响。

深圳市乐安居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杰还记得，每天一大早骑车到30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骑回罗湖贩卖的场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罗湖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说。

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与港澳联系愈发密切，大珠三角地区开始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贸易重镇。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启了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新的时代胜景在这里展现。

“举全省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充分激发‘双区’建设的整体效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效应、辐射引领效应。”2021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如是说。

从“省港”到“湾区”，近百年来，大珠三角的一枚枚“红色足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奋斗历程，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人足音。

（记者 邓瑞璇）
（新华社广州1月26日电）

武隆后坪乡：巧打“文化牌” 乡村添活力



▲1月26日，武隆后坪乡，苗寨土法榨油展示体验成为当地特色旅游景点之一。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脱贫攻坚答卷⑧

□本报记者 罗芸

大山深处的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白石村，云雾缭绕。

1月25日下午，正是冬闲时节，王顺清、冯德友、蔡永林三位年过七旬的党员，眯着眼，很投入地跟着村里的“文人”吴启合念诵最新修改的顺口溜《十谢共产党》：“一谢共产党，人民得解放。过去受苦难，如今把头扬。二谢共产党，改革又开放。下放责任制，家家有余粮。三谢共产党，攻坚战打响。派来工作队，脱贫把路闯……十谢共产党，生活奔小康。文化多丰富，老来有所养。党恩感不尽，群众永不忘。永远跟党走，拥护党中央！”

“这回要得了，不但把后坪这几年的大变化都写出来了，文化生活也加进去了。”王顺清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个《十谢共产党》我们改了很多回，以前只写了生活变好，但总觉得还缺东西。这回把文化加进去，‘味道’够了！”

后坪乡位于武隆、丰都、彭水交界处，曾是武隆最偏远、最落后的乡镇。被列入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后，这里通过发展少数民族风情的文化旅游业，传承非遗文化，用法治文化凝聚人心，边远小镇蝶变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活力小镇。目前，全乡贫困人口发生率从原来的21.9%降为零，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957.6元，同比增长26.6%。

苗寨文化

让游客心甘情愿跋山涉水进后坪

大寒天气，屋里冷得跺脚。文凤村村杨世超一直在调试新购进的酿酒设备，干得满头大汗。

“以前的米酒只能卖周边，加了‘文化’这个东西在里头后，去年酿的1500公斤米酒还不够卖！”杨世超有些得意地说。

米酒在后坪被称为“苗汤”，是苗族同胞用糯米酿的低度酒，口感清甜。30多年前，杨世超就从事米酒制作，在赶场天卖。无奈销量有限养不活一家人，1997年，他只得丢掉家里生意外出务工。

杨世超所在的文凤村，地处偏远的山坳，传统民居保持较好。这里以“天池苗寨”闻名，并被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8年10月，后坪乡引进武隆区喀斯特旅游产业公司，将44户农户的闲置房屋和田山林地折价入股，成立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共同发展文旅产业。杨世超回到家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捡”起了尘封20年的酒坊。

2019年，“云上苗寨·幸福后坪”正式开寨，吸引来市内外大量游客。杨世超的米酒“小试牛刀”，市场反响不错。去年，他又在米酒中加入了从山上采来的桃花，并对“苗汤”的历史和功效进行挖掘，用文化对米酒进行“包装”。

“很多游客看了这些介绍，都很感兴趣。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排队，收钱都搞不赢。”杨世超的妻子乐坏了：没想到苗族文化还能促进自家米酒销售。

杨世超保守估计，去年“苗汤”的缺口至少有1000公斤。于是在冬闲季节，他从外地新购进一套酿酒设备，准备将

产量从1500公斤增加到5000公斤。

在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副理事长罗开伦看来，民族文化是后坪发展旅游的重要推动力：和仙女山这些成熟的景区相比，后坪知名度低，交通条件也才刚刚改善，要让游客心甘情愿地跋山涉水进后坪，依靠特色文化是个好办法。

目前，苗寨将文化尽可能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既满足村民生活所需，又为游客提供体验民族文化的场地。

离杨世超家不远的榨油房就是苗寨土法榨油的展示场。这里存放着长十多米的木制榨机，锤、墙上绘制了土法榨油的过程。因吸纳了6名贫困户，榨油房也成了“扶贫车间”。

几年前，为了恢复这种榨油方式，合作社请来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榨机构造。花了几个月时间，大家才复原了一套全由原木制成的传统榨油设备。

“每回榨油前，我们就喊起老辈子传下来的榨油号子，游客一听就围拢来。这么个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在这里当榨油工的脱贫户曾玉林比划着说。

曾玉林家因学致贫，原来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现在，他和杨仕成等贫困村民成为榨油工人，向游客展示土法榨油的炒制、晾晒、碾碎、榨油和包装的全过程。

参观完，游客往往愿意顺手带走新榨出的菜油。这些菜油每公斤30元左右，比普通菜油价格高一倍，仍供不应求。

有了民族文化内涵作支撑，后坪乡的旅游产业生机勃勃。去年，全乡接待游客人数超过3万余人次，旅游收入300余万元。

受旅游拉动，全乡农业产业也发展迅速。该乡共实施产业项目26个，引进和培育茶叶企业3家，发展茶叶8000亩、中药材7500亩、特色林果2000亩、高山蔬菜2000亩，养殖中华蜂6000群，传统烤烟产业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目前，全乡已实现每个村有2至3个骨干产业，每户有一两项增收产业，特色产业覆盖贫困户95%以上。

法治文化

化纠纷解难题脱贫路上聚人心

临近新年，白石村的村民开始杀年猪。

“老蔡，明天我杀猪，你过来吃个便饭嘛！”贫困户老王看到蔡万田从不远处的田埂路过，追出门来扯起嗓子对他喊。

“要得，明天不来不作数！”心田花蔬菜合作社理事长蔡万田高高兴兴地回答。

谁能想到，在2019年，这两人还曾是一对“冤家”。

2019年3月，经过村民讨论后，白石村准备发展南瓜产业，成立了心田花蔬菜股份合作社，每户入300元。农忙季节，合作社雇村民务工，每天劳务费120元，按天数计算工钱。

2019年5月18日，合作社第一次公示工钱。老王仔细地把账本看了又看，认为合作社少给自己算了半天，相当于少了60元工钱。

脾气火爆的老王找到蔡万田理论，并请其他人作证。但时间太长，大家都记不起这半天的事来。

老王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妻子残疾，靠他一人撑起这个家，况且，没要到钱还失了面子！



▲1月26日，武隆后坪乡，改造升级后的“天池苗寨”在雨雾中美不胜收。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第二天早上，他拎着半瓶农药找到蔡万田：“把工钱补上，把300元退给我。不然，我把这瓶喝下去！”

大家赶紧打电话报警。有人想办法把农药瓶夺了下来，老王的气却没消得下来。

他抓住记账本，“唰唰”几下撕碎，“我得不到，你们都得不到！”这让在场的人都傻了眼。

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给老王上了一堂法制课：销毁会计凭证，依法应受相关法律法规处罚。这下又轮到老王傻眼了。

就在僵持不下时，白石村第一书记杨懿闻讯赶到现场作调解。作为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懿对调解纠纷很有心得。到白石后，他在村里成立了“让一让”调解室，并经常把调解室搬到田间地头。

杨懿一来，先给老王比了个大拇指：每回看到你在地里劳动，都觉得你特别“攒劲”；但你话没说对，比如邻村的某某就因一时激动铸下大错，多可惜！

说着说着，老王低下了头，辩解道：“我又不懂法……”

“不懂就要学。要先记得：法律不讲哪个声音高、阵仗大！”杨懿一边送走民警，一边劝慰老王。作为惩罚，老王被罚在规定时间内将撕坏的账本粘好，还给大家。

回过头，他又给蔡万田建议，公示可以通过网上建群的方式，每天公布。他还帮合作社按相关法规完善了运营制度。

“如果那天这事没解决，大家人心就散了，合作社十有八九也搞不成。”蔡万田说。经过这一番波折，合作社的大小事项都经过社员讨论通过再执行，天天公示，矛盾纠纷少了许多，人社的社员从最初的6户增加到28户。

大家劲往一处使，当年合作社的南瓜就获得丰收。“大河涨水小河满”，老王也得到4000元分红，在合作社的工资收入合计六七千元。

以此事为契机，对口帮扶后坪乡的市委政法委扶贫团积极探索“法治扶贫”。白石村建起法治文化大院，通过讲法、普法，减少群众的矛盾纠纷，并将相关法律法规编成大家喜闻乐见的顺口溜。

近年来，通过“法治扶贫”、宣传法治文化，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后坪

乡调解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各类矛盾纠纷500余起；建成法治文化院坝10余个，培养起一批有文化、有水准的法律明白人（院主），用贴近群众和实际的方式传播法治观念；组织专业人士和法律顾问到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已有上百次。

乡愁文化

“乡情馆”里陈列“老物件”

冬闲人不闲。这几天，高坪村的冉茂云正在传授传统木器制作法。两个学徒已学了两年多，能用脚踩踏板带动上面的刀片将木头削成小巧的酒杯。

今年65岁的冉茂云是当地有名的木匠，能做全套家具。他用山上采的桐子榨油作家具漆。

“这些年，手艺人的饭碗都被机器‘抢’了。”冉茂云说。现代工业制成的瓢盆多且便宜，加上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传统木器制作一度走到无人可传的境地。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冉茂云的手艺感兴趣的年轻人逐渐多了起来。“家乡发展起来了，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想学技术的人也比前些年多得多。”冉茂云很高兴。

在文凤村村委会对面，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乡情馆”，里面陈列的是当地收集的“老物件”：积着厚厚一层灰的走马灯、裂了口的土陶大碗、可以挂在火灶挂钩上的锡水壶……这些都是从乡亲们征集来的，记录着后坪人民曾经的生活。

“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展品可以作为忆苦思甜的‘引子’，让大家感受到老一辈后坪人生活的贫困；另一些精巧的家什很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让年轻人和游客了解我们后坪的苗寨文化。”文凤村村支书赵俊说。

文化，已深深渗透进了后坪的脱贫攻坚乃至乡村振兴中。目前，全乡各村正在实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建设工程，为村民日常生活提供阵地；修复境内留存的渝东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遗迹，并建成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史迹展览馆，宣传红色文化；大力推进非遗文化传承和保护，编印《后坪神韵》乡土教材，实施后坪山歌进校园工程，建起后坪木器非遗传习所，为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场地。



1946年1月27日 沧白堂事件发生

1946年1月27日 郭沫若、王若飞、梁漱溟及李公朴、李德全等政协会议代表和民主人士应“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邀请，在沧白堂向群众报告政协会议进展情况并听取意见。国民党为阻止民主人士的报告活动，派特务、打手冲进会场，对作报告的民主人士进行辱骂和围攻，打伤参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在重庆党组织的带领下，各界群众毫不屈服，继续坚持举办民众大会8次，对配合政协会议召开，推动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